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 中共南方局清华大学教职员党组织

○许京骥（1942土木）

1948年4月，随着学生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党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一支新军突起：平津唐地区清华、北大、北师大、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等七院校讲（师）教（员）助（教）、助理研究员、职员、医务人员等也为反饥饿、抢救教育危机，罢教、罢研、罢职、罢诊三天。这一行动迅速获得各院校同学、工警的响应支持；北大、清华120余位教授也声明支援，罢教三天。“六罢合流”，“师生一家人”，构成学运后期新的特点，推动了整个国统区各阶层知识分子、人民大众反蒋反美、反饥饿的人民运动；第二条战线队伍明显扩大。

清华南方局教职员党组织（以下简称“南系”）在上级正确领导下，率先于院校间发动本校讲（师）教（员）助（教）职（员）反饥饿罢教、罢研、罢职、罢诊运动，对平津唐以至全国院校师生员工相互支持，团结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系与晋察冀城工部清华教职员党组织（以下简称“北系”），在未打通关系的情况下，于活动中相互结识，配合默契。讲教助和职员的反饥饿斗争就是南、北系党组织并肩作战、共同完成的。

（一）南系党组织的发展

及其秘密的、半公开的和公开的外围组织

1937年夏，我于武汉考取清华大学土木系，1938年就读于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工学院小组长，因出版进步壁报《引擎》，工作过于暴露，1941年皖南事变后，列入国民党逮捕名单，疏散至重庆，与我党南方局青运组保持工作关系。1946年春，西南联大党组织领导人袁永熙来渝向青运组汇报“一二·一”运动。我知道他就是1941年疏散我时的西南联大党组织负责人，便向他申请入党。因他将复员北平，领导清华、北大学生运动，相约由我向所在单位重庆中央水利实验处请调清华大学水工试验所后，在清华解决组织问题，可以配合学运做教职员工作。我于1946年11月在清华经袁永熙介绍入党。袁为我引见北平市民盟主委吴晗教授，并介绍我参加了民盟。

1947年9月，袁永熙被捕。10月，上海局（南方局改称）成立新“平津学委”，其负责人李之楠接上并打通了我与北京大学文、法、理学院南系教职员党组织负责人殷汝棠党的关系，将吴征镒、杨捷的党的关系交给我。党组织力量有了加强。

讲教助秘密读书会

当时南系教职员党员不多，都是单线联系。生物系讲师吴征镒（时为北京市民盟副主委）、机械系教员杨捷、数学系讲师田方增复员清华后，在党的关系未转来前、而且在彼此不知是党员的情况下，贯彻原党组织领导人嘱咐的“勤学、勤业、勤交友”、“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联大老读书会清华成员的基础上，吸收新成员，在清华建立了新的读书会。参加的讲教助有中文系王瑶、季镇淮，地质系张澜庆，物理系何成钧、汪志华，法学院汪籛、郑垚等，加上由学生支部转来的数学系助教徐利治和我，共十儿人，其中就有民盟盟员七八人，是我们和民盟合作的据点。我们学习党的政策文件，讨论时局与学校发生的政治运动和大事。读书会多数成员在校年代较长，联系面广；在文、理、法、工学院都有分布；许多成员在过去清华、西南联大历次运动中都是骨干。因此在以后推动讲教助联合会的成立和扩大民主教师宣言签署上，起了关键性作用。

教职员半公开社团——工学院的CEMA社和图书馆的集美会

工学院的CEMA社和图书馆的集美会，二者都是在1947年下半年，为扩大圈子，团结更多具有不同程度进步倾向和政治态度的教职员，由南、北系党员或他们联系的进步骨干发起成立的。初期采用联欢、郊游、参观等活动形式，以发展友谊为主，以发现、联系有进步倾向社员。后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增加学习党的政策

文件，访问或邀请民主教授张奚若、雷洁琼、李广田、陆志韦等座谈时事等内容，提高了成员的政治觉悟，在以后开展的连署签名成立讲教助联合会或夺取职员公会领导权以及反饥饿罢教罢职运动中，都起了积极作用。

工学院的社团称CEMA社，取土木、电机、机械、航空、建筑等系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拼联而成，由北系党员解沛基、王先冲和我等发起。首任主席为解沛基，前后成员有屠守锷、董寿莘、吴良镛、朱畅中、张傲、李国鼎、王遵华、曹恺荪、何东昌、樊恭杰等三四十人。

职员中的社团称“集美会”，由南系联系的图书馆进步骨干王志诚、吴人勉（1948年春，二人均入党）和北系党员梅克为核心，发展到二三十人，还油印出版《习作集》，开展歌咏演剧等活动。

全校讲教助联合会

1947年，物价狂涨了约20倍。北平院校教职员工家室人口多的，三餐不饱，儿女啼饥号寒，有的甚至神经失常而自杀。许多教授不得已靠卖书为生。教育也濒临破产。在同学们“反饥饿、反内战”、“求生存”浪潮的推动下，1947年5月8日，清华讲教助、职员280人联合签名，上书梅贻琦校长，要求提高待遇，无答复。为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10月间，吴征镒、杨捷、解沛基、王先冲等南、北系党员发起成立讲教助联合会。他们依靠党员，讲教助读书会、CEMA成员，按系连署签名，正如发起带头人吴征镒所说：“与过去在西南联大时组织讲教助联合会遭到破坏不同，这次是顺势而

□ 纪念建党90周年

成。”联合会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开成立大会，推出张澜庆、何成钧为理事会正副主席，王先冲（北系党员）为干事会主席，吴征镒、吴良镛为干事。王先冲1948年10月去解放区后，董寿莘任干事会主席。讲教助联合会在以后支部领导开展的罢教、罢职、支援学运、迎接解放、进城宣传等各项斗争中都起到了公开号召、组织群众的作用，还推动了当年冬至次年春成立了北大、燕京、师大、北平研究院等在京高等院校教职员的相应组织，为1948年4月平津唐七高校教职工团体联合开展反饥饿斗争打下基础。

在反饥饿罢职斗争中争得领导权的职员公会

教职员中，职员工资低，物价飞涨对他们生活压力很大。1947年下半年，他们就成立了“职员公会”，想通过组织的力量，争取权益，改善生活。不过当时掌握领导权的上层职员总想与外界团体如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系，搞救济物资。之后，随着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深入，职员群众通过自己的力量争温饱的要求逐渐呈现。1948年3月下旬，党支部做出开展反饥饿罢教、罢职的斗争的决议，职员中的党员通过集美会成员发动签名，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要求行动。4月3日下午召开了职员公会大会，讨论是否罢职问题。会上经过斗争，通过了罢职决议，改选了理、监事会。理事会正副主席为王志诚、吴人勉，领导权夺到了我们手里。此后，职员公会在各次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支部及其外围秘密核心组

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的组建与发展

1948年3月，南系教职员党组织改由王汉斌领导，转来了航空系助教何东昌、生物系助教李建武、清华成志小学教导主任王松声、图书馆王志诚、土木系助教王有秋及胡东明的关系。王汉斌指定成立了以许京骐为书记、何东昌为副书记、吴征镒为委员的三人支委会，并逐步改变单线联系的方式，每三人建立一个党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及其领导力量有了很大加强，讲教助读书会也发展成为三个读书会小组，分别由党员小组长李建武、王志诚和张澜庆（张在清华解放后入党）负责。

支部成立之初，4月就胜利地领导开展了讲教助、职员的罢教、罢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很多积极分子。5月，经王汉斌批准，在各读书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简称“新文建”），党内由李建武为负责人。八、九月间，王汉斌指示，为迎接解放，在经过斗争考验的“新文建”成员中加速发展党员。“八·一九”国民党大逮捕，支部经受了一次锻炼与考验，力量无损失。10月，经王汉斌指示，撤退了在斗争中暴露明显的吴征镒。11月，晋察冀城工部余涤清接上南系党支部关系，将它与清华北系教职员党组织关系打通，汇合成清华大学南北统一的教职员党组织。此后，直至12月15日清华解放，除10月至11月继续开展教职工“请假告贷”的反饥饿斗争外，主要是迎接解放，组织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知识分子政

策，部署保护学校设备财产。清华解放后，支部与市委进城工作团荣高棠同志取得联系，指示组织全校教职工进城工作团，去城里中学宣传，迎接北平城的解放。

截至1948年12月15日清华解放时，南方局教职员支部党员发展至22人。

（二）领导开展了讲助教和职员的反饥饿罢教、罢研、罢职、罢诊斗争，扩大了学运的队伍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陷入政治、经济、教育危机，民不聊生，已见前述。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又取消了对公教人员两袋面粉的供给。这就使教职工生活雪上加霜。为此，1948年3月，北大、清华教职员13团体，先后上书国民党和教育部，提出：恢复配给面粉、按物价指数调整薪津和提高教育研究经费等三项要求，均无答复。广大教职工群众对反动政府更为不满。

清华教职员党支部在分析这一形势时，何东昌首先提出发动群众罢教、罢职的建议，得到了支委会的赞同。王汉斌同意这一意见，认为教职员群众多数虽已认清国民党反动面目，开展罢教、罢职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仍有不少人心怀疑虑，不愿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王指出，应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争取更多中间群众，提出适合大多数人的迫切要求而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决定只提经济要求，不提政治要求；而且，罢教罢职是定期的，在此期间与大家一起，分析“饥饿”的原因，揭露反动政府罪恶的战争政策，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以后王汉斌布置学生支部配合，教职员支部紧急布置，通

过党小组、读书会、新文建、CEMA成员以及进步教职员串联签名，由讲教助联合会做出4月6—8日罢教三天的决议；4月3日职员公会经过斗争也作出自6日起罢职三天的决议；由于学生支部的工作，工警工会也宣布响应。

经许京骥与北大教职员支部负责人殷汝棠联系，通过北大讲教助联合会俞铭传、郭沂曾（南系党员）向平津唐各院校联系；吴征镒与北平研究院简焯波联系，争取在反饥饿斗争中一致行动。最后除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外，还有北京师院、南开、北洋，河北工学院共七院校的教教职工团体参加。

4月5日在北大北楼，由清华讲教助联合会干事会主席王先冲主持，以平津唐七院校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北大孟庆哲、殷汝棠等参加，发表了由俞铭传、吴征镒起草的《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申诉“我们的正当收入已经为政府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征收了90%以上，除了三餐不给，儿女啼饥之外，有的弄得神经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自杀，……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呼吁，请政府维持原来配发面粉的办法、按照实际生活指数，按月调整薪给。唇也干了，笔也秃了，所得到的答复是一概不准。”“我们现在除了采取积极行动以促使政府接受外，已别无其他办法。”他宣布自6日起，七院校罢教、罢职、罢研、罢诊（主要是北大医学院医护人员）、罢工三天。会上“中央社”记者提出“质问”，胡说什么“你们教师的生活比普通老百姓高多了，还说什么‘反饥饿’？”当场受到王先冲的驳斥，强调罢教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民请

□ 纪念建党90周年

命，而这正是你们报界的责任。

北大、燕京、师大、中法各校同学为支援教职工的斗争，宣布继续罢课三天；北大、清华一百二十余教授声明响应，同时罢教三天。

6日，清华工友们齐聚大礼堂开会，宣布罢工三天。会后，他们高喊着：“向政府要饭吃”的口号，冲出礼堂，在校园内举行了示威。为支援工友罢工，同学们在罢工期间组成了突击队，担负起工友们的全部工作。

7日晚，教职工在同方部挤满一堂，举行“生活问题座谈会”，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掠夺，第一次喊出了“只有反抗，才能生存”，“只有团结，才能胜利”等口号。

8日晚，全校师生员工齐集大饭厅，举行了团结大会，高呼：“团结就是力量”，斗志昂扬。

虽然斗争经济成果甚微，学校庶务组慌忙发给工友每人40斤玉米，校方只允许向教职员借支薪金，但政治上收获很大，更多的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敢于起来反抗了。学生罢课，教职员罢教、罢研、罢职、罢诊、罢工，“六罢合流”，全校团结，相互支持，并肩作战，为“四·九”师大血案的反迫害、反美扶日以及10月的争温饱斗争打下了基础。

平津唐地区广大师生员工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师生员工的有力支援，上海、南京、武汉、厦门、咸阳、四川、浙江等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起到了相互配合、支援的作用。

港九进步报纸对此反应强烈，《华商

报》4月7日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北大、清华教授反饥饿大罢教，职员罢工、学生罢课支持》，报道了北大、清华、平研究院讲助教、职员、工警反饥饿自6日起罢教、罢工三天，北大、清华教授80余人罢教、学生罢课支持等新闻。

港九民主人士郭沫若、邓初民、马叙伦、谭平山等分别于4月18日、20日、22日在《华商报》发表题为《声援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谁个能够不奋发？》、《控诉蒋朝暴行，声援学生运动》、《我们应该大踏步前进，声援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支援革命的第二战线》等专文，声援支持四月平津学运，高度评价平津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团结一致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意义，认为学运出现了新的特点：“与去年‘五·二〇’运动不同，教授、讲师、学校职员，乃至校工都和学生联合在一起而参加了斗争”，“这是反动统治内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表示”，“是在整个革命形势、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客观上是配合人民武装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扩大与发展”，“因此这对于蒋管区城市群众运动而言，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点。”

8月，国民党政府将法币改为金圆券，物价陡涨，教职员每月薪津只能维持四口之家8天的生活。在党的领导下，全市掀起了争温饱求生存的运动。10月20日，北平中小学为“挤购面粉”总请假4天；25日，北大王烈等82位教授签字发表停教宣言说：“物价迫着我们不能不忍痛停教三天，……要求学校一周内借支薪津二月，以免冻馁。”清华讲教助联合会、

职员公会宣布自26日到30日为“告贷”总请假5天，予以响应；同学也宣布停课5天支援。

10月28日晚，清华讲教助联合会在大礼堂召开“生活问题谈话会”，请教授、职员、工警、学生参加。会议一开始，就到了600多人，教联会主席张澜庆主持并讲了话，问题很快集中到生活极端困难的根源——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上，讨论极为热烈，形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致声讨。一位教师在会上说：“今天的政府要我们挨饿，我们偏不挨！要我们受冻，我们偏不受！政府要我们死，我们偏要活！”还有一位教师说：“两年前，清华闻一多教师死于凶杀，两月前朱自清又死于贫病。贫病！贫病是无理的社会对人民的凶杀！”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生活互助会”，大家想的是“天快亮了”，“清华一家，共渡时艰”，迎接解放。

（三）依据党员的不同条件，支持或参加学运

平津学委袁永熙、王汉斌等对清华教职员党组织的要求是：作好教职员本身的工作，组织上与学生支部不打通关系，工作虽应相互配合，但不要求积聚起来的教职员进步力量直接参与学运。

尽管如此，一些党员和进步群众仍然依据自身的条件，积极支援或直接参加了学运。

配合民盟，声援学运，扩大签署进步教授严正声明、宣言和抗议书

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以来，

民主党派或教授不断发表“声明”、“宣言”，抗议国民党暴行，支持学运，作用巨大，影响深远。1947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签署范围开始进一步扩大与发展。

清华、北大等平津院校讲师、助教、职员在这次运动中，首次并且之后，都参加北平民盟支部主委吴晗发起的以民盟名义或进步教授连署方式发表的各种“声明”、“宣言”的签名活动。1947年5月28日发表的《呼吁和平宣言》，提出教育、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蒋介石政府发动并坚持内战，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依照政协路线解决国是，就有平津八院校教职员586人签名，其中清华143人。同年11月，北大、清华、燕京三校教职员抗议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害，声援学运、发表宣言；1948年6月12日，反美扶日运动中，清华、北大等校教职员437人发表对司徒雷登声明的抗议书；紧接着6月20日，清华大学教职员110人，由张奚若、金岳霖、吴晗、朱自清领衔，为抗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退回配购证，发表严正声明。朱自清贫病交加，但身体力行，8月12日患胃病危重，弥留时，还不忘拒绝美援，叮嘱夫人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同年7月16日，北大、清华、燕京、师大教职员123人为抗议屠杀在京东北学生的“七·五血案”，和学生自治会一起，联合向北平警备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接着，由朱自清、刘仙洲、吴晗、张奚若、闻家驊等领衔的北大、清华、燕京

□ 纪念建党90周年

教职员404人为同一事件又联名发表了抗议书。

这些支援学运的声明、宣言或抗议书又是从何而来呢？据清华教职员支部委员吴征镒回忆：民盟华北支部、北平市支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是他们的负责人吴晗与党和民主党派高层密切磋商而推出的，而且大都是根据当时形势下教授们的思想与要求，由吴晗和余心清（民革中央常委，曾被捕。建国后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马彦祥（著名戏剧活动家）、崔月犁（晋察冀城工部学委负责人）在清华西院吴晗家中麻将牌桌上，详细磋商，写成初稿，然后以民盟的意见拿出来，并与华北支部其他负责人刘清扬、张东荪、张申府和潘光旦、费孝通等民盟主要成员商量定稿。当时吴征镒担任民盟城内外交通。有时盟内刘清扬、张申府和张东荪意见有分歧，吴晗要吴征镒和同是民盟北平支部负责人的陈鼎文到燕京大学张东荪家中协调。为避免党派色彩，特别是在1948年夏，民盟被取缔后，这些宣言、声明不用民盟名义发表，大多以教授个人名义参加，联名发表，常由几位著名进步教授，如吴晗、张申府、刘清扬、张奚若、钱端升、闻家驷等先签。一些倾向进步的中青年教授费孝通、钱伟长、屠守锷、孟庆基（少农）和从昆明转来的民盟成员吴征镒、王瑶、季镇淮等，常是吴晗家的座上客，参与议论，便签署其后，然后再通过民盟关系和党领导的清华、北大等院校秘密读书会、进步社团成员以及其他各种渠道，向广大教授、讲教助扩大签名。

清华一些资深老教授如理学院的周培源、李继侗、赵以炳、陈桢、张席禔、袁

复礼、冯景兰；文学院的金岳霖、浦江清、许骏斋、余冠英；法学院的陈达、陈岱孙、李景汉；农学院的戴芳澜、俞大绂、刘崇乐、汤佩松、裘维藩等，因与吴晗、费孝通等进步教授过往不多，多由吴征镒出面征署。吴虽是讲师，却比一些刚回国的年轻副教授在校年代还要长，算得一个“老清华”。他广泛参加学校活动，注意结交、团结老教授，而且往往以一个有正义感的“学究”面目出现，不显得太“左”，容易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在形势发展的大背景下，他携稿家访，大多可以征得签名，得到他们同意的。他还通过有进步联系的北平华北学院徐大德、铁道学院的王芳荃、北平研究院的简焯坡广泛征署。

1947年秋及以后，形势发展很快，清华差不多每个系、每个行政部门都有讲教助读书会成员或集美会、讲教助联合会、CEMA社骨干，便通过他们，按单位向所联系的导师、教授、讲教助、职员等扩大“宣言”、“声明”的签署，如王瑶、季镇淮向朱自清，何成钧向叶企孙，吴良镛向梁思成等征得签名。这样，才使涓涓细流汇入大海，清华、燕京教授发表声明支援清华教职工“五罢”斗争的，最后达一百二十多人。

抗议血洗师院，与学生一道 参加“四·九”大请愿

1948年4月9日凌晨，国民党特务血洗师院，捕去同学8人。消息传来，激起清华全校师生的愤慨，在4月6—8日“六罢合流”、团结对敌的基础上，住在工字厅的单身教职员王先冲、解沛基（以

上北系党员)吴征镒、杨捷等三四十人,在同学队伍的邀请下,争着加入到学生的请愿示威行列,赶到新华门北平行辕向李宗仁抗议,要求放人。游行中有的讲教助参加了纠察队,杨捷除了领着大家高喊:“打倒特务”,“我们要饭吃”的口号外,还喊出了“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呼声。在新华门前,吴征镒、俞铭传分别代表清华、北大讲教助联合会讲了话。

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清华有一位教师参加游行,曾被讥为“疯子”。这次,一下子就有40多人参加了大请愿,师生团结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与学生一道恢复、组织“剧艺社”、“新诗社”活动

“剧艺社”、“新诗社”是西南联大进步师生“一二·一”运动中在闻一多先生悉心指导下组成的。吴征镒经闻一多先生介绍参加进去,和学生党员王松声成为“剧艺社”领导人。

清华复员北平后,吴征镒配合1945年底的反美抗暴运动和1948年6月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北大红楼民主广场朗诵自作的讥讽美帝、美军的新诗,犹如一支投枪。他还和学生党员郭良夫等在联大“剧艺社”的基础上恢复、建立“清华剧艺社”,且为负责人。

为纪念“一二·一”运动一周年,清华剧艺社在大礼堂演出了由郭良夫编写的《审判前夕》和王松声编写的《凯旋》等活报剧,此时南北同学会师、交流,为当时的抗暴运动助威。之后,正值寒假,剧艺社又不顾政府禁令,排演了茅盾创作的《清明前后》,赢得广大师生赞赏。剧

中,吴征镒跑龙套,扮演了一个“老听差”,还担任颇为繁重的服装、道具供应工作。

1947年初,联大剧艺社学生负责人王松声辗转来平,无业,暂住吴征镒家,吴请朱自清先生设法帮王在校暂谋安身之处。联大时,吴曾与朱自清一同执教于昆明私立五华中学。复员后,吴、朱在清华北院比邻而居,常有过往。朱先生政治立场鲜明,当时正全力编辑出版《闻一多全集》,民盟、讲教助联合会、学生社团有事或在运动中找他,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从不拒绝,甚至第一个在支持学运宣言上签名。王松声,中文系毕业,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朱也深知王是个进步街头剧作家,遂在教授会上提出,任命王松声为清华附属成志小学教导主任,使王得以返校,以职业掩护,继续参加“剧艺社”活动,仍为其中领导人。

1947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清华剧艺社在校内上演了活报剧《金銮宝殿》,极其辛辣地揭露和讽刺了“伪国大”的召开。吴征镒以本色出场,作为清华讲教助的代表,向反动政府要饭吃。《金銮宝殿》的演出和同天下午在同方部的诗朗诵会上吴征镒朗诵的讽刺新诗,相互呼应,矛头直指蒋介石,给当局震动很大。特务们向清华训导长褚士荃追查剧本作者,由于地下党通过学生自治会灵活应对,他们终未能得逞。

在潘光旦先生掩护支持下,
为校图书馆申购进步书刊,编目
借阅

“集美会”领导人、支部党小组组长

□ 纪念建党90周年

王志诚，1940—1944年在昆明云南大学文史系、社会系读书时，参加党的外围秘密组织“南星社”等活动，后经南方局华岗同志指派，去党的“据点”路南县县立中学工作。1945年末，王志诚复员北平，找到清华图书馆馆长、民盟领导人潘光旦教授求职。王在云大时就是民盟盟员，又是潘师的学生，对他非常仰慕，两人常有交往。潘师慨允在图书馆为之安排工作。

王志诚利用自己在图书馆任中文编目工作之便，每逢六部口新华书店有新的进步书刊出售，便开书单订购，潘馆长总是会心微笑签字。后来王为少给潘师找麻烦，就找吴晗先生商量好，购买这些进步书刊时，由吴签名。在清华，教授都有权推荐买书。这样做，对工作、对潘先生都要便当些。

北平军调部中共办事处被迫撤退后，代表团留下一批解放区出版的图书，如《论联合政府》、《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都存放在东交民巷苏联领事馆里。吴晗便找到王志诚，让他把书取回藏在图书馆里。王还把有些书做了些伪装处理，塞进图书馆大阅览室的参考书架，供大家阅读。收藏这些书是经过潘先生同意的了。

为学生支部和“一二·一” 图书馆秘密收藏进步书籍

1946年冬，袁永熙利用我主管土工试验室的方便，让学生支部负责人尚嘉齐将三大箱进步书籍存在我专管的储藏室内，由他来存取。由此我和他建立了党的横向关系。

清华学生会为纪念“一二·一”运动

成立的“一二·一图书馆”，有很多进步书籍供大家阅读。一有风吹草动，国民党警特有可能入校搜查、逮捕时，馆中书籍就通过王志诚运到大图书馆仓库藏匿。

收录、传阅邯郸新华电台广播

1947年初，徐冰离开军调部时留下一台七晶体管收音机，交辟才胡同民盟市委机关使用。1948年下半年，民盟遭到取缔，北京市民盟机关疏散，吴晗让吴征镒将收音机取回清华。袁泰、初原夫妇（民盟，党员）在新西院家中和许京骥、方焯一起，用它收录邯郸电台广播，复写后分送教职员和学生支部传阅。

土木系党员助教胡东明、王有秋在土木馆主管试验室内，也收录邯郸新华电台广播，被北平警备司令部发现。经支部研究，胡撤往解放区，王返四川家乡隐蔽。

当时邯郸新华电台传播郑州战役、淮海战役节节胜利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师生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掩护进步同学撤退

1948年，清华“八·一九”大逮捕，“剧艺社”裴毓荪、李泳等三同学隐蔽到北院吴征镒住所，由王松声帮他们涂改了身份证，亲自送他们由成志学校翻墙进城。

王志诚也曾利用图书馆仓库，掩护过“八·一九”大逮捕黑名单中的同学。

（四）南北两系教职员党 组织合并，迎接解放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开始。北平学委负责人余涤清

向我布置了迎接解放的任务：打通清华南北系教职员许京骐、樊恭煦、梅克之间党的关系，统一清华教职员党组织，宣传学习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争取教授留校；保护学校人员生命、财产和仪器设备、资料档案等安全；维护海淀镇秩序。

清华教职员党组织依靠党员、新文建、读书会、讲教助联合会、CEMA、职员公会，迅速动员起来：刻印各种材料，宣传即将解放的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组织学习，对一些教授，还邮寄了宣传政策的函件，动员他们留校；通过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调查、保护学校的财产，特别是贵重的仪器设备，登记造册。

12月13日上午，远处传来炮声隆隆，由远而近，战事临近，气氛紧张，学校宣布停课，学生自治会对战事早有准备，当日便组成了巡防委员会，教职员方面，由党员屠守锷、樊恭煦、解沛基和钱伟长、李辑祥、张维等教授参加。巡委会下设学生纠察队，严守校门和楼门口，并巡逻护校。下午，一队国民党炮兵强行闯入气象台附近，架设炮位。为保护可能落下炮弹的北部师生宿舍区的安全，巡委会组织有关师生及家属撤至南边各系馆集中住宿。我和方焯也得到通知，晚上全家携铺盖，撤至土木馆楼下地板上睡觉。因国民党炮兵深夜被迫撤走，翌日各自返回原宿舍。

当晚，我又赶到海淀镇高中老同学李维城家，通过他父亲，海淀镇国民党区分部领导人、商会会长，了解到警察正在向城里撤退，海淀已成真空。我当即按照余涤清的指示，亮出共产党员身份，责令其保证海淀安全。他许诺追回警察，维持治安。

1948年秋冬，潘志新拟往解放区，因战事滞留我家。1944年秋，潘因成立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救亡会”而遭殴打并被开除学籍，与我结识，成为至交，转学浙江大学。此时他代表浙大联由香港开全国学联会议后来平，恰逢清华解放前夕，我们二人彻夜在家刻写、油印党的文件，就在12月13日这一天半夜，又在校园内张贴欢呼清华解放的标语。

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解放了！

不久，南北二系党员公开，近30人在北系党员梅克家中见面，原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大家欢呼雀跃，共庆解放！

教职员支部与来到青龙桥的北京市委进城工作团荣高棠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后，荣布置我们组织教职员进城，做中学师生的宣传工作。

教职员党组织又一次掀起全校教职员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各项政策的高潮，准备了大量宣传材料和演讲稿、歌咏、秧歌剧等节目，成立了约200人的“清华教职员进城工作团”（占全体讲、教、助、职约500人的40%）。

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来清华接管，清华正式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和何东昌代表教职员支部，向来接管的钱俊瑞、张宗麟同志，汇报了支部护校经过，并将受到保护的全校主要仪器设备清册，以及教职员政治思想情况等书面材料，交给他们。

2月3日，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门举行“入城式”，工作团和同学们一起，由清华乘坐火车至西直门再步行赶到前门，汇入群众欢迎队伍，在箭楼以南排

对熊向晖老学长的一次访谈

○徐心坦（1961水利）

1997年6月，作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成员，我拜访了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传奇性的人物、老学长熊向晖。他在抗战期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打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潜伏12年，为党中央输送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访谈地点在熊老位于复兴门外大街24号楼的寓所。当年熊老78岁，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在整个访谈过程中，他始终处于为母校当年进步力量的强大而感到无比自豪的精神状态。

熊老从1936年9月他进入清华学习讲起，“进校后在当时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学诚的影响下，我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

织‘民先队’的活动，并当上了‘民先队’管理组织工作的队委兼秘书，负责收队费，每人每月两角钱。清华的‘民先’队员我都认识，队员人数一共183人，这个数字错不了。那时，清华从九级到十二级（注：指当时四个年级的在校生）约有900多人”（注：民先队员约占在校生的20%）。“1936年12月8日，我由蒋南翔、杨学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蒋南翔住在清华，但在北平市学委工作”，“我入党宣誓是由杨学诚监督，张承先领誓”，“入党后，我与张承先、康世恩一起过组织生活，1937年2月，我发展了许立群”，“抗战前清华

开。我们近距离目睹了长长的威武雄壮的解放军坦克、大炮、兵车队伍自南向北开进，群情激动，高呼欢迎口号。下午，工作团分赴指定中学，进行宣传，约在2月底完成任务后撤回。

在此前后，清华教职员政治热情很高，“新文建”已发展至近百人，在进城宣传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彭真同志在慕贞女中教堂向清华、北大等校教职员党员和清华“新文建”、北大“新文联”等成员作报告指出，党可以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自己的先锋队，但不能在成人中建立另一个先进的政治组织，不能有第二党，火车头只能有一个；各校“新文建”、“新文联”等组织成员，够

党员条件的入党；各校应成立包括教授在内的、全体教职员参加的教职员联合会。于是，清华“新文建”宣告解散，成立了新的包括教授在内的清华教职员联合会。

2011年1月29日

注：本文根据1984年上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清华教职员支部党史资料》改写、增订而成。此前承吴征镒、王先冲、解沛基、王志诚、李建武等同志提供宝贵资料，谨此致谢。

更正：本刊第15辑158页图片说明中，赵国平（右）与顾义芳，应为邹定祺与顾义芳。